

沙特自传

沙特 著 谭逸 译

新潮文庫

沙特著
譚逸譯

沙特自傳

志文出版社印

關於沙特

譯者

法國作家在精神論戰方面常有煽動的天才，但自福祿泰爾 (Voltaire) 以來，沒有一位法國作家給文明世界所帶來的恐慌，可與尚·保羅·沙特 (Jean Paul Sartre) 相比擬，這位現年六十二歲的前任教授，身材矮胖，有一雙大而發亮的眼睛，他是一位哲學家並自稱是一位存在主義者 (著有：「存有與空無」 "Being and Nothing"、「什麼是存在主義」 "What is Existentialism")，他也是一位小說家 (「嘔吐」 "Nausea" 「理性的年代」 "The Age of Reason")、劇作家 (「蒼蠅」 "The Flies"、「沒有出路」 "No Exit"、「[E]敬的娼妓」 "The Respectful Prostitute")，論說作家 (「情境」 "Situations"、「聖·簡納」 "Saint Genet") 和自傳作家 (「辭語」 "The Words")。他曾對呻吟而共鳴的大眾發出了滔滔的宏論。在他作爲一個反抗者，否定者，一個凶狠而不妥協的幻想家的角色時，乃以分析兩次大戰之間法國民主的衰敗而開始。他一生中遭遇的首次戲劇性的大挑戰是法國的被德國所征服，這一事件鼓舞了法國民族性格中最卑劣與最英武的特質。沙特與阿伯特·卡繆 (Albert Camus)、佛朗沙·莫利

亞克 (Francois Mauriac) 他們一道，冒着生命危險與犧牲個人的自由，擔任着「反抗」的作家英雄角色；爲此他曾被關進納粹的集中營。後來，無神論的沙特與天主教的莫利亞克，多神論的卡繆分道揚鑣，從事「解放」而擔任政治領袖的角色——政黨的創始者、宣傳家、正義鬭爭者。永遠的宗派分立論者。悲哀者與虛無主義者的曖昧關係，曾使沙特式的存在主義，盛行一時，其對大眾的影響亦極深遠。基督教的「存在主義」，不能與歐洲革新與戰後混亂的智識行爲主義者相抗衡。沙特的個人新陳代謝在這種競爭中佔了上風——至少在爭取青年人心理上的鬭爭，搶先了一步。

緊接着戰後的那一段時期，巴黎人陷於神經質、危險與忿怒中，當時沙特與西蒙·包瓦爾 (Simone Beauvoir) 的愛情，他的經常涉足「二猴」與「弗洛」咖啡館，以及逛「塔布」、「紅玫瑰」夜總會等，都變成了他神話生活的一部份。沙特並創刊了一種叫「時代」(Les Temps Modernes) 的月刊，以解釋他對一切事物，從條規到個人自由等的非傳統的論點。當時，存在主義的字彙——諸如「痛苦」(anguish)、「遺棄」(abandonment)、「失望」(despair) 與「絕望」(forlornness) 等——自他滿溢的心坎裡傾瀉出來，以至反論地建議對生活的熱愛與諷刺性的快感。這位哲學家的悲觀主義似乎在使人類有追求快樂與行動的自由。

但在法國與全歐洲美國化之後，人們對沙特的舊調：「你的生命是荒唐的……上帝並不存在

……只有在背叛傳統的理性意念下，人生才有意義。」開始感到厭倦，舒適的新生一代在「弗洛」、「二猴」咖啡館談生意經，欣賞女子，而不辯論實在的概念。大眾雖然對劇作家的沙特感到興趣，但對英雄式的沙特却已厭倦。——而他似乎已放棄他所計劃的哲學巨著和長期計劃的一連串的小說的寫作。人們開始認為沙特是一顆流星，他已經完了。

緊接着他與卡繆鬧翻之後所發生的相互責罵，使過去許多擁護他的人都掉頭而去。他曾採取不妥協的立場堅決反對法國保有她的殖民地的努力。由於他對阿利及利亞問題的態度，幾乎使他坐牢，他被斥為叛國者，他所住的公寓也挨了炸彈，他被迫搬了家，但他仍繼續不停的寫作。

於是乎，他似乎要證明一位作家在進入墳墓以前，不能認定他已死亡，一顆外表上費盡心血的炸彈再度爆炸了。「辭語」(“The Words”)，他的自傳的第一卷之發行，使他再度被尊為法國文壇的祭酒。他的意識形態的反對者和私人仇敵，懷着稀有的，非法國人所固有的寬宏大度，公認這位狡猾的小老頭又一次成功了——或是終於實踐了他的諾言。他已創造了一部具有英雄力量的作品，一部將為未來稱為天才的作品。自傳式的「白久」已成爲法國文學高度精鍊的風格——自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與蒙田(Montaigne)到紀德與簡奈(Genet)——但沙特的「辭語」却給它帶來了新的力量與意念。他不僅講述他的故事而且提出他的觀點——而他是以舒暢的，機智的和生動的筆調寫成的。他說，辭句與觀念不是真實的事物，然而他們却是人

類所能抓住真實性的最接近的方法。

基於沙特的特質，他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被選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而沙特本人却對這五萬三千美元的巨額獎金視作文學機構的一種賄賂，他要求他們不要將獎金頒發給他，而他們則照頒不誤，他則堅拒不受。一九五八年俄國詩人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在蘇聯政府壓力之下曾拒受諾貝爾文學獎金，而沙特則是有史以來主動放棄這種最高榮譽的第一人。

當時他拒絕獎金的理由有二：即個人的理由和客觀的理由。

他個人的理由是：他一向拒絕官方的榮譽。他認為一個作家採取了他的政治、社會或文學的立場後，只應就其所寫出來的話而行動，他所接受的任何榮譽都會使他的讀者感受到一種壓力。這是沒有益處的。

他的客觀理由是：他認為當今文化戰線唯一可能的戰鬭，是求得東西兩個文化的和睦共處。而兩個文化的遭遇，必然以衝突的形式出現。但此形式應產生於人與人、文化與文化之間，而無任何機構插手其間，他是兩大衝突的產物，便不能接受任何高階層文化機構所頒發的榮譽。

十六歲研究哲學

沙特十六歲時本想做一個小說家。但他爲了進高級師範學校，不得不研究哲學。他當時的志

願是做一名文學教授。後來，在無意間讀了柏格森 (Henri Bergson) 的一本著作。柏氏在書中以具體的方法描述人的腦子如何體念着時間，因此沙特亦體會出此一真理。隨後，他發現了現象學 (Phenomenology)，那就是說，他懂得對任何主題都可以用具體的方式討論之；同時也可以用哲學的方式討論。他有一種構想，用具體表達的技巧將文學與哲學結合起來——自哲學提供方法，文學供給語文。他最感到興趣的是事物與人之間的稀奇與具體關係，隨後，是人與人之間的具體關係。

存在主義哲學

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受德國哲學家海德格 (Martin Hegger) 的影響最深，當二次大戰時，沙特被關進納粹集中營，獄中只准戰俘閱讀海德格的作品。海德格在他的最後分析中指出：物體即用具 (Objects are Utensils)。因此沙特在他第一本著作「嘔吐」(Nausea) 中，曾以觀察樹木，並企圖用文字來給它們下定義——它們究竟是什麼，如此以歸結到本質；換言之，他對各種事物採取永久懷疑的態度，並企圖去證實它們究竟是什麼。物體是什麼？(What are objects)？我們為何來到世間 (What are we here)？我們何所事 (What are we upto)？就海德格看來，一株樹就是砍下來做柴火或者用作建築材料的東西；一株樹的意義在於它作何用

途 (a tree is what it's used)，像一個人一樣。但沙特認為人可以自由地認識他自己，爲他自己或他人作自由的選擇。我們不能在表面上觀察一個人的人生結構。他認爲，甚至當他煮一杯咖啡時，他便在改變着世界。他在「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一書中解釋說：一個人的任何決定，小的決定與大的決定一樣，可以決定全人類的命運，所以人一定要擔負起完全而巨大的責任。

人是被判定自由的

沙特認爲：「人是被判定自由的。」(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他指出：人是毫無藉口的被擲進了這個負責任的世界，所以是被判決的 (Condemned because he is thrown in the world responsible, without any excuse)。『吾人被永恒的價值所遺棄，必須創造自己的價值』(Abandoned by eternal values, we must create our own values)。至於如何去創造價值呢？沙特用「初期的選擇」(Original choice)來表達一個人自我創造的那一瞬間——一個包括某一段時期的長期瞬間——在此期間，一個人開始自我創造，在此之前，他乃是被別人所塑造的。沙特說：我們開始是由別人所塑造的，然後，我們從別人塑造我們的地方開始，重造我們自己。(We start by being made by others, and then we remake ourselves, starting out

from what others have made of us.) 但當我們重造我們自己的那一瞬間，發生一種辯證的過程：我們發現我們與我們自己原來的期望以及他人對我們的期望大異其趣。他認為這就是自由，但那不是一種愉快的事。這就是他所說的：「人類是被判定了要自由的」。

沙特與女人

雖然沙特沒有正式結過婚，但却喜歡和女人混在一起，他喜歡漂亮的女子，討厭醜女人。他說：男女間的關係免不了要發生性愛。一個醜女人雖然能給男人帶來一種與女人在一起的特別快感，但她的醜貌却大殺風景。他認為當男女間的關係被醜貌所打擾時，那便索然無味了。

他之所以喜歡與美貌的女子在一起而不願意和男人為伍，也有一番理由。他認為男人非常討厭。他們具有一種特殊的感受性，而且讀的都是職業或事業的問題。但女人則有許多出自女性方面的特質，而事實上她既可作你的奴隸，又可作你的同謀者。因此，她的感受性要比男人感受的幅度為大。她可以迎合你的興趣。與男人在一起，不是談職業上的煩惱，便是談學術問題。他認為學術上的問題可以獨自一人埋頭研鑽，而且其樂無窮。與男人談論則得不到一點樂趣。女人是異性，而且她們的智慧可能超過男人，所以他情願和美貌的女子在一起，而且身邊也經常圍滿了漂亮的女人。像他的膩友西蒙·包瓦爾(Simone Beauvoir)那樣完全的解放的女性，乃是他所

最爲欣賞的。

沙特曾表示：女人曾在他的生活裡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但在他的著作中却從不提有關女人和情愛的事。他說：「我對那些狂喜之事知道得很清楚。但要我將他們寫下來却覺得乏味得很。因爲強調他們的概念是你今天可以實際上做一個『男子漢』，而事實上則不可能。卡繆可以說：『爲了快樂我們必須高舉男權。』那是非常對的。但他認爲它可以而且必須予以立刻高舉；換言之，即快樂的情況『今天』即可以獲致。如果一個人將自己官能的快感記錄下來，即可使所有人分享其快樂的話，那我同意他的說法——但獨自的享受他們，乃意味着與我們人類同胞的某些關係隔離。同時，作爲一個作家，我覺得應從事於最適合於我的工作——爲他人所不能爲者。我常常想到有一天我將寫一些有關我的快樂之事，但隨後我又提醒自己，關於我生活的這一面，實在是不足爲外人稱道的。」

「他人卽地獄」

沙特認爲人自出生後即須順從他所投入的那個境遇。因此，他在「沒有出路」(Nausea)中說：「他人卽地獄」(Hell is other people)。他說：如果你生爲一個富家子，或爲一個醫生的兒子，或爲一個美國人的兒子，那你的未來便已被設計好了，你的未來是他人給你決定的。

他們並未直接地創造它，但他們是塑造你的那個社會秩序（social order）的一部份。如果你是農人的兒子，那麼社會秩序便要迫使你走向都市，那裡的機器在等着你，那些機器需要像你這樣的人去開動。所以，你命裡注定要成爲某種工人。於是工廠便是你存在的一種機能（the factory is a function of your being）。你的「存在」（being）的意義是什麼？它就是你所從事的「一種工作，這種工作徹底主宰着你，因爲它給與你薪金而消磨了你，它將你列入某一等級而決定了你的生活水準。所有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人強加於你身的。所以地獄便是那種存在的最適當的描寫。

人類爲現代文明所「隔離」

沙特認爲命運的改變會極費事，但人不可聽天由命，人如聽天由命那就更糟。那便是他所謂的現代生活的「隔離」（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life）。他指出：在我們社會秩序中人常爲物質所支配，而這些物質又是他人所製造。這些「他人」並不和他面對面的遭遇。而是通過物代表而侵犯着他。我們被所有現代的文明隔開了。如此我們自己也變成了物。這便他所說的「隔離」（alienation）。他認爲如要改變命運打破隔離，你便要採取行動來反抗人們將你塑成的那些東西而改變你自己。因此他說：自由是可以爭取的目的。

但爭取自由有何可行的方法呢？沙特認為道德規律是無法自己發明的，它必須有些事件是已經存在了的。道德家不能與宗教的創造者混爲一談，穆罕默德是利用了現存的宗教；衆所周知，所有可蘭經都是根據猶太教而寫成的，穆罕默德自稱係直接受先知的感召：「先知說我們必須這樣做。」但一個真正的道德家——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一個道德制度創造它自己的法律，而不顧及既存在的道德律——當然，不妨修改它們——將不能成爲真正的道德制度。它只是反映傳佈那種道德律的人所屬的那個社團的觀念而已。

他並以紀德爲例加以說明：紀德說：「條條大路通上帝。」因此他宣揚「狂熱」(fever)，「渴」(thirst)，「向肉慾的享樂投降」(surrender to sensual joys)等等。他說：你以爲紀德的道德律對一個工廠的工人，甚至對一個忙碌的工程師或醫生有意義嗎？它的所有的意義是：「我，紀德，屬於中產階級，並在那個階級裡培養了一種特別的感受。那就是我所以能致力於文學工作的原因。這種文學工作表示我有一種適應各種不同的經驗的感受性。」這便是我們給一位中產階級作家的道德律。它可爲屬於同一階級的作家所接受。沙特說：雖然他自己不屬於那個階級，但他能了解它，他如像紀德那樣去作，說不定也會快樂的，但那種忠告對在裝配線上工作八小時的工人，便是一種損失。當他被一天的工作累得頭昏腦脹時，你怎能叫他到外面去做出轟動一時的驚天動地的事業來？

沙特並且指出：工人的問題不是保有他的自由，而是贏得自由。而我們必須幫助他去贏取自由，他認為名符其實的道德律的條件並未出現，所以今天談不上真正的道德制度。他指出：人們之間有太多的機器與社會結構阻擋了他們的視線，所以人們不能彼此看清楚對方。他說：今天談真正的道德制度是不可能的；所談的道德律僅只適用於某種階級或反映特定的習慣與趣味而已。他強調說：人們創造新的社會秩序的基本條件尙付缺如。在像我們這樣的一個社會裡，社會各種結構的羣體——姑不論個人的強制與私人的命數——必然形成相互瞭解的障礙。如此你帶着自己命運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步，而當你遇着另一個懷着他自己的命運的人時，則任何真正的關係的建立必極為困難。你所遇到的人在你看來，將不是一個完全的人；他將是一個「物」。要不然，你必定屬於一種「運動」，而你在那個運動裡才能完全擺脫那個運動外面的一切事物（You must belong to a "Movement" in which you make a total break with everything outside it.）

所以，他認為今天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同胞關係，我們必須與物的秩序鬭爭。那是最值得的道德律，至於何種人將爭取他們的自由，他們是否能得到自由，何時能贏得自由，那不是我們完全孤立——隔離——的人所能逆料得到的。我們只要把人當人看待，那是原則的問題，那是我們決不能放棄的原則。

富有而不為物所役

沙特雖然很有錢，但他却痛恨據有財物。他認為吾人常為外在之物所奴役——無論是金錢或財物。因此，當他喜愛一件東西時，常要把它送給別人。這種表示並不是慷慨，那只是他希望別人來做物的奴隸而不是他自己。而當他想到有人喜歡他所贈送的物品時，便感到愉快。

不作名譽的俘虜

沙特承認在某方面有些喜歡名譽和地位，但他却不願為一時的名譽和地位所累，而變成名譽和地位的俘虜。他常視「此時此地的名譽」只是一種暫時的條件，而隨時願意將之拋諸腦後。他堅持着一種天真的幻想：一個人能夠經常改善他自己。他常常警告着自己說：「我已寫過許多書，但是，如果我認為我對我在這些書中所表達過的思想的辯護視為已任而不顧事實的變化時，那我就不再是我自己而將變成我的著作的犧牲品。」他認為一個人不應該像紀德那樣選定一點，有規則地與一個人的過去分開；但他希望能經常改進。他不願為他過去的言論所束縛，然而，他却願對自己所寫的每一個字負責。

文化應為全人類服務

沙特並表示文化應是那些以重視人類全體的幸福的工作。他強調文化必須認識：它所生存的世界，還有兒童們餓死。文化必須認識：作為作家和人類，我們有能力替他人做一些事，而他人也能為我們做一些事。

"Literature should be the work of clear-eyed men wh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otality of Mankind. Literature has got to realize that it exists in a world where children die of hunger. Literature has got to realize that it lies within our power, as writers and human beings, to do something for Others. And others can do something for us."

一九六八年四月

於臺北

第一篇 讀書

一八五〇年左右，亞爾薩斯（Alsace）有一位子女太多，負擔過重的教員，欣然地變成了一位雜貨商，這位放下教鞭的店員，想要得到一些補償，由於他正放棄了心智的教學，他的兒子當中將有一個從事於心靈的教學，家裡應該有一位牧師；那將是查禮（Charles），但查禮偷偷地跑了；他寧願去做馬戲團的騎師。家裡把他的照片反掛在牆上，從此大家都不准再提到他。下一個該輪到誰呢？奧古斯特（Auguste）趕忙做效着他的父親，進了商界，而且混得不錯。剩下來是路易（Louis），他沒有特別愛好，那位父親便拉着這個沉默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把他變成了一個牧師。後來，路易忠順地遵守着父訓，並依樣畫葫蘆地產生了另一位牧師——阿爾伯·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當其時，查禮並未曾找到他那馬戲團的騎師職務，而他父親的高尙意圖，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一生都保持對崇高事業的熱愛，他不曾夢想逃避家庭的職業，他願意獻身於一種崇高的理想，而選擇了德文的教學。他在家人團聚時常常說：「路易最孝順，奧古斯特最富有，而我最聰明。」兄弟們會大笑不止；妯娌們則嘟囔着嘴。查禮·史懷哲（Charles Schweitzer）和馬康一位天主教徒律師的女兒路易絲·季雷馬（Louise

Guillemin) 結了婚，她對他的蜜月旅行恨透了。他在喜宴終了之前便匆忙的跳上了火車。直到七十歲，路易絲仍然談說當年在一家鐵路餐廳所吃的韭菜沙拉：「白的全給他吃了，剩下給我的都是綠的。」他們在亞爾薩斯停留的兩星期中，從未離開餐桌，他們兄弟以法國北部省份的鄙野方言相互笑謔，基於基督徒的慈悲心腸，那位牧師常常把他們的談話翻譯給她聽。不久之後，一位殷勤的醫生，給了她一紙證明，使她得以免除夫婦間的性生活，而有一間單獨的臥室。她說她頭痛，並習慣於躺在床上，她開始恨噪音、情慾、熱心以及史家那種粗魯和戲劇式的生活。那位活潑、精明但冷漠的女人，因為他丈夫的輕信與說謊，她便懷疑一切：「他們聲稱地球在打轉轉，那他們是怎麼知道的呢？」在一些道德的演員包圍下，她對演戲和道德感到憎恨，那個精靈的實在論者，已經迷途而跨進了一個粗鄙的精神主義者的家庭。她從未閱讀過福祿泰爾 (Voltaire) 的作品，但基於反抗而變為福祿泰爾學派的擁護者。奢華、矮胖、醜陋、活潑，她變成了一個純否定論者。純粹為了她自己的緣故，她在揚眉、顰笑之中，將所有莊嚴的態度喪失殆盡，關於這一點卻沒有被任何人發現。她那消極的驕傲和自我本位的否定腐蝕着她。她目中無人，她是太驕傲而不願求人施惠來獲取第一的頭銜，太虛榮而不能以第二為滿足。她會說：「去了解如何使人需要你。」她曾經最爲別人所需要，然後，別人對她的需要越來越少，於是乎，因為見不到她，人們終於忘記了她。現在，她幾乎從未離開她的椅子或床鋪。自然主義者和清教徒——這種道